

胶片里的抗战史与民族精神图谱

郑坤

看点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与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历史交汇点,《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史料根基,重绘了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电影的精神版图,通过电影产业变迁折射民族命运。这是一部用光影书写的抗战电影史,展现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作者不屈的精神风貌及电影作品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重大作用。



光影铸史,胶片为证。《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以下简称《光影山河》)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深入考察14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探讨战争对中国电影产业及电影艺术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书中研究了抗战初期电影

生产、大后方艰苦卓绝的抗战电影宣传、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创作,以及香港和上海两大“孤岛”电影生产、上海沦陷时期电影与伪满时期电影文化入侵等动荡时期的电影发展。通过对战火中中国电影业曲折命运的生动描绘,本书彰显出抗日战争的恢宏画卷,展现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作者不屈的精神风貌及电影作品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重大作用。这不仅是对电影史的回顾,更是对那段艰难岁月的致敬。

透过独特的文化视角,作者深度解析特殊历史语境下的艺术创作。《光影山河》在时间上以“十四年抗战”为框架,从九一八事变延伸至抗战胜利,揭示早期电影如《风云儿女》(1935年)如何通过知识分子觉醒叙事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敲响民族救亡的钟声。在空间上将沦陷区、大后方(重庆/成都)、根据地(延安)、上海及香港“孤岛”五大地域电影生产纳入统一视野,尤其重评沦陷区电影。书中认为,上海沦陷后的电影并非皆属“叛逆”,许多作品以伦理题材或历史隐喻(如《木兰从军》)暗藏抗争,形成“苦闷的繁荣”。

《光影山河》一书将散落于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与“孤岛”的影像碎片缀连成史,让胶片显影为一部悲壮而多元的民族抗争史诗。书中以“胶片化武器”为核心隐喻,剖析电影如何双向作用于战争。《八百壮士》直接再现四行仓库保卫战,激发“中国不会亡”的民族气节;《狼山喋血记》借“打狼”呼吁全民抗日,《塞上风云》以民族团结叙事凝聚边疆力量。电影史在此成为一部精神抗战史——镜头是枪,银幕是战场,而观众的热泪与呐喊,则是胜利的号角。

在史料挖掘上,《光影山河》实现了多重突破,还原被遮蔽的历史现场。《光影山河》的学术根基,深植于对多元史料的系统性挖掘与互证,其突破性价值在于还原了中国抗战电影史中长期存在的“黑洞”。作者团队不仅广泛收集了战时官方审查记录、电影人日记与书信、伪满洲国

及汪伪政权的文化政策文件,以及当时中日报刊的原始报道和影评,更通过这些档案文献,生动还原了沦陷区电影人在高压下的复杂生存状态与文化暗战策略。例如,对上海沦陷后电影审查内幕的揭示,清晰地展现了创作者如何在日伪严苛管控的夹缝中,运用历史题材或家庭伦理故事进行隐晦的抗争表达。

尤为珍贵的是本书对影像实物史料的深度运用。书中精选并呈现了140余张珍贵的电影剧照、海报、广告以及放映记录。这些凝固的瞬间——无论是《壮志凌云》中军民同仇敌忾的激昂画面,还是《小玩意》中叶大嫂面对家国破碎时那饱含热泪的特写——绝非简单的插图点缀,而是强有力的历史物证。它们直观地证明了影片在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乃至“孤岛”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存在着隐秘的流通与传播网络,有力驳斥了以往研究中认为战时电影生产地域封闭的“地域封闭论”。这些图像让尘封的文本记载瞬间鲜活,使读者得以窥见当时观众所见的银幕世界。

为了弥补档案可能存在的空白,作者高度重视口述史料与个人回忆录的价值。通过梳理大量影人的战时流动轨迹、合作网络以及他们在战后面临的复杂经历,这些来自个体的声音,揭示了在民族危亡与强权压迫的双重困境下,电影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与道德困境,使历史图景呈现出更为复杂、真实且充满张力的肌理。

电影不仅是记录历史的媒介,更是鼓舞士气的精神武器,是抗战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光影山河》一书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电影的梳理,展现了中国电影人在抗战时期不屈的精神风貌,以及电影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重大作用。从内容架构来看,全书分为多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聚焦于抗战时期电影发展的不同侧面。开篇“电影的觉醒:从无声到抗战的呐喊”,讲述了无声片的余晖与民族电影在抗战烽火中的转型,为后文抗战电影的全面发展作了铺垫。“镜头下的抗战:故事与现实的交织”则深入

探讨了抗战故事片、纪录片以及多样化影像抗战宣传的诞生与发展,展现了电影如何通过故事与现实的交织,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民族力量。大后方电影、根据地电影、孤岛电影以及沦陷区电影在不同章节被分别阐述。大后方的银幕传奇中,官营电影的崛起与使命、苦干创造奇迹的大后方电影创作,体现了电影在特殊环境下的坚韧发展;根据地人民电影的缘起,展现了电影为人民服务、鼓舞根据地军民士气的独特作用;孤岛的影像记忆,描绘了上海与香港电影人在困境中的坚守与抗争;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以及伪满与华北的电影文化侵略,深刻揭示了侵略者在文化领域的险恶用心以及电影人在压迫下的苦闷与挣扎。

更为前沿的是,作者创造性地引入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的日报刊数据库和影评杂志进行了地毯式检索与关联分析,成功“打捞”起众多长期湮没无闻的“黑洞期”影片信息。比如,书中细致考证出1942年上海某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看似寻常的影片中暗藏的反战台词,以及东北影人如何通过拍摄看似“无害”的乡土题材影片,在日伪文化殖民的框架内进行坚韧的本土文化抵抗实践。这些通过技术手段重新发现的碎片,将沦陷区的电影生产从被简单标签化的“失语地带”,还原为一个充满策略、暗流涌动、极具张力的文化抗争现场,极大地拓展了对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版图的理解。

《光影山河》的作者南京艺术学院秦翼教授与张丹副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在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光影山河》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抗战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本书具有启示作用,它展示了抗战时期电影人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进行艺术创新,如何将电影与时代紧密结合,为当代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生命尽头的哲学对话

刘逸南

在生命的尽头,人该如何面对死亡?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探寻生命的意义?朱锐教授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以深刻的哲思和赤诚的生命体验,呈现了一场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深度对话。这本书不仅是朱锐教授学术生涯的思想结晶,更是他以生命为笔,书写的对世界的热爱与关怀。朱锐作为专业哲学家,其思考更具系统性的哲学深度和专业性,尤其在解剖死亡恐惧、分析生死概念、探讨生命价值等核心哲学命题上,洞见更犀利。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部“临终哲思录”是哲学思考在最极端生命情境下的真实呈现。202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朱锐在春季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告诉学生,自己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朱锐更想如常地上课。2024年7月15日,他与一名年轻人约定,每天中午11点半,以生命与死亡为题展开对话。对话进行了10天。7月25日,对话结束,

7天后,朱锐含笑停止了呼吸,终年56岁。《哲学家的最后一课》震撼人心之处,便是对死亡的直面剖析。朱锐承袭苏格拉底“哲学即练习死亡”的思想,同时融入存在主义与东方哲学的智慧,提出“死之为化”的观念,将死亡视为大自然生生不息中的一环。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朱锐以自身经历为蓝本,深入探讨了死亡焦虑的根源。他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生命连续性的误解。当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条线性的、不可中断的轨迹时,死亡便成了这条轨迹的戛然而止,令人恐惧不安。但如果把生命理解为宇宙间气的不断物化与流转,那么死亡就不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过程中的自然阶段。

传统哲学往往忽视身体在认知和存在中的重要性,而朱锐在书中则强调“不理解恐惧是因为不理解身体”。他结合自身的神经生物学背景,深入剖析了身体在面临死亡时的体验,尤其是疼痛

对认知存在的重塑作用。癌症带来的剧痛,使他深刻体会到身体功能是生命体验的基础,“强健的胃”这一隐喻,形象地表达了身体状态对生命感受的影响。在病痛折磨下,他没有陷入绝望,而是从疼痛中感悟到“身体的舞步中展开世界的可能性”。身体的疼痛让朱锐对存在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意识到,身体不仅仅是灵魂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感知世界、体验生命的直接途径。在与疼痛的抗争中,他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这种体验使他的哲学思考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入生命的具体感受之中。他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读者,身体的体验是哲学思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真正关注身体的感受,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与死亡的本质。

除了对死亡和身体的深刻思考,朱锐还在书中对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哲学审视,提供了一种超越虚无、找寻生活意义的视角。他表示,当

代社会的“高欲望”现象,本质上是价值单一化的恐惧投射。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无尽的内耗之中。为摆脱这种困境,他呼吁以“低内耗”的方式重构生活。朱锐提出,真正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追求”,应该在重复性的工作中寻找精神自由。他批判现代人受“日历时间”(机械计时)的奴役,主张回归“事件时间”(意义节点)与“身体时间”(感知当下),让时间充满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弱势群体作贡献”“爱是主体的退场”,我们应该以利他性的生存方式实现自我价值。例如,他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中,始终强调要为大我作贡献,保持善良的心,这种理念贯穿于整本书中。朱锐以自身行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坚持授课、思考、关怀”证明,即使在最脆弱的时刻,人依然可以保持精神的强健与创造力。

数字洪流中的人性镜像与自我寻找

孟育芳

提示 石一枫的新作《一日顶流》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精湛的叙事技巧和对时代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又荒诞性的网络世界。小说聚焦当下网络流量生态下的众生相和人性之复杂,以及个体在数字洪流中的自我迷失与寻找。作家不仅是对当下网络文化的一次深度剖析,更是对科技发展与人类关系进行的哲学追问。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石一枫的创作始终以其对时代敏锐地捕捉和深刻的洞察而备受瞩目。作为“科技小说”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一日顶流》延续了石一枫对技术与人性的深度勘探。从《地球之眼》的监控伦理到《人魂枪》的虚拟沉溺,再到本书对流量经济的解剖,石一枫以硬核现实主义笔法,构建了一部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作家在《一日顶流》的创作上实现了对以往作品的突破,将现实主义与科技元素深度融合,为当代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以往的作品中,他虽然也关注社会现实,但在《一日顶流》中,他大胆地将最新的科技元素融入小说中,如人工智能、直播技术等,使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他没有将科技简单地作为故事的背景,而是让科技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和机遇,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信息茧房、网络暴力、隐私泄露等。石一枫通过这部小说,将这些问题摆在读者面前,引发人们对数字时代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反思。

在内容设计上,作家描绘出荒诞与现实交织的网络浮世绘。《一日顶流》的故事围绕着北京青年胡幸既展开。胡幸既是一个平凡无奇,甚至有些社恐的年轻人,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着自己的烦恼和执着,比如对童年伙伴李蓓蓓那份

纯真而长久的情感。一次意外的直播事故,让他脱口而出的“谁来管管我,我该如何是好哇”瞬间走红网络,他摇身一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求管哥”,被卷入了流量的巨大漩涡之中。石一枫巧妙地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紧密交织。从胡幸既与父亲胡幸既的日常生活,到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各自经历,都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小说从1999年的网络千年虫、486电脑写起,一路回溯互联网在我国发展的关键节点,穿插聊天室、BBS(论坛)、门户网站、博客、微博、公众号、短视频、直播间等平台的更迭,具体到胡幸既那里,是一路升级的上网设备、电脑配件以及“红警、星际、魔兽”等游戏。这种对网络发展历程的细致梳理,不仅是胡幸既、胡幸既父子网络生活的背景,更是整个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让读者深切感受到网络如何一步步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

小说的主旨深刻而多元,其核心在于探讨在流量至上的时代,个体如何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保持自我的清醒与独立,不被数据洪流所吞噬。胡幸既的成名是一场意外,也是时代的缩影。在成为顶流之后,他发现自己已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生活不再属于自己,那些铺天盖地的关注和评论让他感到恐惧和迷茫。这种恐惧不仅来自于网络暴力和隐私的暴露,更来自于自我的迷失。他原本只是一个渴望被爱、被关心的普通人,却在流量的漩涡中逐渐失去了自我的本真,成为一个被流

量定义的符号。石一枫通过胡幸既的经历,揭示了流量时代的悖论:一方面,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平凡人有机会一夜成名,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另一方面,这种关注往往是短暂而虚幻的,人们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真实自我和生活本质的关注,被流量异化,成为数据的附庸。

在艺术手法上,《一日顶流》展现了石一枫高超的叙事技巧。他摒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采用多视角切换与时间交错的手法,使故事充满了层次感和节奏感。小说中既有胡幸既的第一人称叙述,让读者能够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恐惧、迷茫和挣扎;也有第三人称视角对其他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拓宽了故事的视野,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图景。例如,胡幸既的直播片段与父亲的论坛往事并置,通过不同视角的切换,将父子两代人的网络生活和内心世界进行对比,揭示了网络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深刻影响。同时,时间的交错叙事,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想象,让故事在回忆与现实、现实与虚拟之间穿梭,增强了故事的张力和可读性。

《一日顶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它对当下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小说对科技与人类关系的探讨,也为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时,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向,让我们认识到科技虽然强大,但它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和精神追求。

读到

暑期书海逍遥游

李海卉

夏日炎炎,书页沙沙,美好而自由的暑期时光,正是快意读书时。书海浩瀚,如何不溺不滞?读书,当有路径。蒙田说:“初学者的无知在于未学,而学者的无知在于学后。”总有一些书读得大广,却读不通。“读得太快或太慢,都一无所获。”看看名家如何读书,可以让初探阅读的人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体会的人,也会有更多的领悟。

读书之妙,首在姿态多元。《古今名人读书法》不仅记录了读书的方法,更是一部中国人阅读的历史。书中采集古今300余位名人读书心得,列为800余则,上自孔孟,下至蔡元培、胡适之,以时代为序,依次罗列。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悠然,与钱钟书牛津图书馆十余年笔记狂魔般的执着相映成趣;老舍凭“印象甚佳”选书,鲁迅主张“跳过去读”的智慧,织就一张多元的阅读地图。

诸葛孔明隐居隆中时,好友石广元、徐庶等人读书“务于精熟”,唯独他“独观其大略”。后来,精熟者止步刺史郡守,观大略者却成一代贤相。诸葛亮“观其大略”法,如鹰隼掠过长空,重在把握思想脉络而非字句雕琢。

温儒敏认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读书,要引导学生接触人类文化经典。在《温儒敏谈读书》一书中,温儒敏谈到,年轻时多读一些经典,可以为精神成长打底子。阅读经典,要的就是那种了解、思考、涵养的过程,这是“养性”也就是精神成长的必经途径。

陈平原在《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颠覆了对阅读的刻板印象。他提倡“不务正业”的阅读方式,讲述自己研究武侠小说时,如何从《三侠五义》追溯到唐代传奇,再延伸至民间信仰研究。这种看似随意的阅读路径,实则暗合学术发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研究江南园林时,不仅要读《园冶》等典籍,更需亲临园林感受空间布局与文化意蕴。他特别强调“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性,认为实地考察、人际交往都是阅读的延伸。

阿根廷学者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将阅读升华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阅读如呼吸,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只要还有这个功能在,‘书本’就一直在等我们。”他笔下的阅读者鲜活灵动:惠特曼在老树林里读但丁,阳光穿过叶隙吻上书页;8岁的科赛特枕着《悲惨世界》入睡,“像一只狗舒适地躺在它的狗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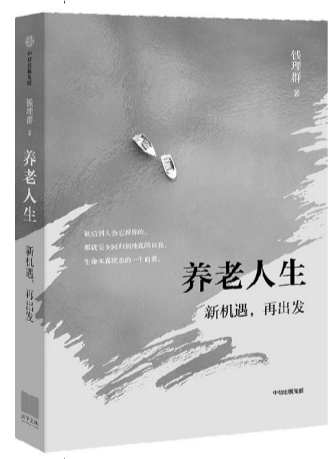
优质阅读的核心在于构建个性化的阅读生态系统。这既需要《古今名人读书法》中对传统方法的借鉴,也要像《阅读史》那样理解阅读的文化语境;既需要温儒敏教授的方法论指导,也要践行陈平原打破边界的阅读理念。阅读不应是机械的知识灌输,而应成为认知升级与生命成长的催化剂。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时,不妨将这些阅读智慧转化为具体行动: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文本,以系统思维构建知识体系,带着生活困惑与书籍对话,在跨界阅读中发现新的可能。如此,阅读终将超越单纯的消遣或学习,成为一场不断发现自我、重塑认知的精神旅行。正如曼古埃尔所说:“阅读的力量,在于它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或许就是阅读最本质的意义。

纸页间的清风明月,终需亲自涉足。这个夏天,愿您与某本“意外之书”撞个满怀,或许在图书馆转角处,或许在旧书摊泛黄的扉页间,正藏着您尚未谋面的灵魂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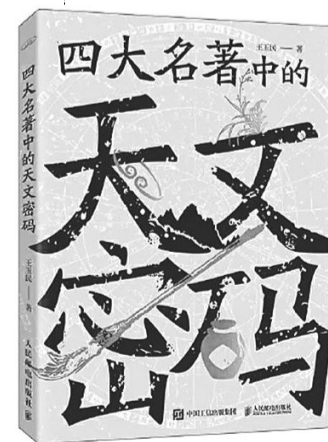
荐书

以新视角再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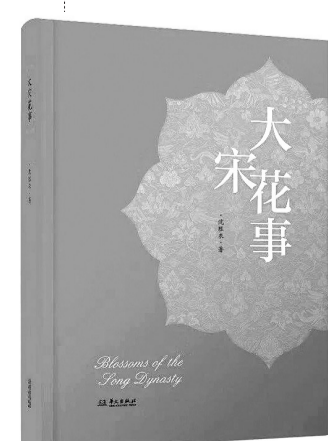
《养老人生:新机再出发》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基于自己和老伴儿进入老年之后,关于养老儿生规划和思考的随笔集。作者钱老自2015年同老伴儿住进养老机构之后,开始了另一种养老人生,并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了数百万字作品,甚至比退休前创作热情更加高涨。本书在给读者提供思考和启发之外,也可以作为一种老年生活方式的参考。



《四大名著中的天文密码》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选取四大名著中与天文相关的故事情节、习语典故和诗词歌赋,介绍了古人对天文的认识。作者王彦玉为北京古观象台研究员,在书中充当导游带领读者到四大名著这座博物馆的“天文厅”作一番游览。这样不但对古代天文知识有系统认识,也会对四大名著的内容有更深入、更新的理解。



《大花事》华文出版社

本书意在为“聚焦花木文化,对与植物相关的宋朝人物、故事、作品和风尚,作一点相对小众但切实有趣的挖掘和解读。”书中以多元化的视角展开叙述。作者沈忠关注花与人、花与历史、花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将花卉与历史紧密相连,通过对宋代花事的深入研究及梳理,揭示了花卉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